



古田会议史料丛书

GU TIAN HUI YI

古田会议

傅柒生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古田会议

傅柒生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田会议史料/傅柒生主编.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ISBN 7-5065-5133-0

I. 古… II. 傅… III. 古田会议(1929)-史料

IV. 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7939 号

古田会议史料·古田会议

作 者:傅柒生

责任编辑:丁晓平

责任校对:柒 生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话: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龙岩中艺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A5

字 数:280 千字

印 张:10.625

版 次: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5 月龙岩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5-5133-0/K·531

定 价:73.00 元(全三册)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古田会议的回忆与思考

(代序)

萧克

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决议，集中了从中央到四军党内的集体智慧，为我军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并作为伟大的建军建党纲领载入史册。历史早已证明，古田会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党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领导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惨痛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认识到掌握军队和进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迫切性。7月下旬，中共中央组织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举行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几天之后，党中央召开“八七”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错误领导，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9月，毛泽东在湘东赣西边界地区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时期，海陆丰、广州、黄麻、湘南、赣东北、湘鄂西、洪湖等地的武装起义，也先后爆发了。随着革命斗争中心的转移，战争形式也由北伐时期的长驱直入和夺取大城市的正规战，转为农村游击战，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下，建立游击队、赤卫队，壮大红军，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形成“工农武装割据”，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形势。红四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红四军不同于旧军队，主要是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在军队中有了一定的基础。列宁领导的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当时对我们很有影响。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有共产国际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参与，在军队中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开展革命政治工作，使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大体上得到团结，这是中国军队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周恩来就是这时期政治工作的主持者，他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先驱。南昌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要建立新的革命军队，在新军队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其党代表制度，坚固的本党的士兵支部”，“应组织革命士兵委员会”，这些对初创的红军也具有积极意义。朱德、陈毅能带领保留下来的部队举行湘南起义，董朗、颜昌颐能带领南昌起义溃散的队伍到海陆丰参加彭湃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各地起义军能够坚持下来并由小到大，主要原因是部队中有共产党的组织，有党的领导及政治工作的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①

红四军虽然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但由于红军刚建立不久，其主要成分又是北伐军的雇佣士兵和大量的农民及解放过来的兵员，旧军队作风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地反映到红军中来。突出的是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如有的干部对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问题的制度不习惯，感到受约束，喜欢“长官说了算”。有些干部认为军队只管打仗，喜欢“走州过府”，政权观念薄弱；对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农民协会、建立游击队和农村中党组织，不关心或不大关心，不积极做群众工作。部队中打骂现象也比较严重，连长、排长打了战士，过两天开士兵委

注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0页。

员会，也可以打连长、排长的手板。部队进至闽粤赣边，甚至出现枪毙逃兵的野蛮行为。这些都说明，古田会议之前，好些干部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认识并不深刻。

当时，其它地区的红军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的红军应该怎样建设？这一历史时代提出的问题，各地区的党和红军领导人都在探索，在思考。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也在探索之中。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古田会议，红四军经历了两年多革命战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革命形势发展的情况下，亟需加以总结，才能提高红军的政治质量，担负新的革命任务。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曾总结了一些经验，但当时条件还不成熟。“七大”之后，国民党军对苏区的三省“会剿”开始了，前委决定将一、四两个纵队留在闽西扩大苏区，二、三纵队去闽中从外线打击福建方面的敌人。虽然打了两个胜仗，但由于闽中一带党组织和群众基础比较薄弱，自然条件也不利，正是雨季，山高路险，不得不退回闽西。退回之后，收复龙岩，攻下上杭城，消灭敌卢新铭部1000多人，使闽西苏区得到了扩大。但在根据地尚待继续巩固，大量解放过来的士兵尚待教育的情况下，中央又来信说桂系与粤系军阀发生新的冲突，要红四军乘机到东江活动。我们到东江后，同蒋（光鼐）、蔡（廷锴）部队打，没有打好，只好再退回闽西。这期间，毛泽东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陈毅去中央报告工作，红四军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有些削弱。所以在红四军“八大”及其后，很多干部要求毛泽东回来。10月下旬，我们从蕉岭向梅县进军那天，陈毅从上海回来，带回了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样，全面总结两年来红军建设的经验，条件具备了，时机成熟了。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毛泽东于1929年11月26日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28日在长汀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为开好这次会，前委主要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齐心协力，作了很多准备工作。他们利用作战间隙，召开地方干部座谈会

和各支部、纵队的党代表联席会议，还找一部分干部、战士谈话，仔细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共同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毛泽东根据中央来信内容和红四军的实际，为大会主持起草了决议案。12月底，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来信，并作了以反对枪毙逃兵为主要内容的讲话。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经验教训，改选了前委，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二)

古田会议决议，是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团，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的基本原理和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以及两年多红军建设的经验的集体创作。决议分九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整个决议的核心，它规定了我军的性质、任务和宗旨，确定了共产党对军队实施领导的原则和措施，明确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强调要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红四军成立以后，在毛泽东为首的前委领导下，就注意防止和克服单纯军事观点。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朱德就领导我们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那时候，我们每打开一个地方，就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建立革命组织，农会、赤卫队，成立苏维埃政权，在没有党组织的地方，还帮助建立党的组织。这对于创立、巩固、发展、扩大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旧军队观念的残余和农民意识的影响，红四军中有一部分人忽视做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有的干部强调军队只管打仗，不愿意做群众工作；有些干部对分兵掩护秋收和打靖卫团，也不够积极，怕分散后发生情况应付不了；对于发枪给地方武装，不太舍得，或不太舍得发好的，也不太舍得把优秀干部调到地方和游击队去。当然，

多数同志是个思想认识问题，是个会不会做群众工作的问题。针对当时红四军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决议进一步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样，就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旧军队的政治界限。

在红军初创时期，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一定的比重，曾一度产生了流寇思想。这种思想主要表现为政权观念薄弱。毛泽东强调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把它作为中国革命引向全国胜利的出发点。这个思想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秋收起义遭到严重挫折后，在浏阳文家市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上，毛泽东就敌我对比形势作了分析，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主张军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转移。此后，毛泽东提出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主张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红军就无法进行长期而又残酷的革命斗争；就不能解决农民迫切要求解决的土地问题，更谈不上吸收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大批农民参加红军；在军事上就无法进行良好的教育训练；在组织上就不能造就大批干部，迎接全国胜利。红军时期，在要不要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等的有根据地和有计划建设革命政权的正确做法；另一种是忽视根据地的流动游击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是走州过府，招兵买马，打了就走，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像住伙铺一样。伙铺门前有副对子：“天将晚矣君何住？鸡既鸣兮我不留。”这怎么能把根据地建立起来？

盲动主义思想是红军初创时期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这种思想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综合，其结果必然把党和红军引向脱离群众的歧途。1927年冬和1928年春，盲动主义错误造成的损失，对我党我军有深刻的教训。如湘南起义，形势

很好。由于盲动主义的错误，乱烧乱杀，成为后来退出湘南游击区重要因素之一。当时有个突出事件，是郴州市委提出要把马路两旁各烧五里。他们说，敌人来进攻就没有房子住了。但是，农民坚决反对，加上反动派挑拨，10个县委委员被杀了9个。这些同志是坚决革命的，但被盲动主义断送了。当时，对这种盲动主义政策不但没有引起重视，在湘南特委的代表3月到宁冈的时候，反而批评边界特委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这个错误虽然逐渐得到纠正，但到1929年还有残余，仍有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蛮干行为。有些政策如对城市中等商人和乡村小地主、富农征收过重，还有烧县、区衙门和靖卫团团长房子的现象。所以又在决议中提出来，并指出其社会来源及纠正的方法。

红四军的党注意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部队，树立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但是，当时党和红军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不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和指导工作，因而在一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着主观主义，给红军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如1928年，湖南统治阶级正处于暂时稳定时期，军阀鲁涤平拥有重兵。可是，当时的湖南省委却把鲁涤平说是“十分动摇”、“恐慌万状”。这样，就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要井冈山的部队去湘南，去湘东，要在城市里搞暴动。结果造成了红军去湘南的失败。右的倾向也产生过。1929年初，革命处于低潮，中央于2月9日给红四军来信，对红四军的力量估计过低，要红军分为二三百人的几支部队，分兵活动，要毛泽东、朱德到上海去。他们都不同意，下面更不愿他们走。不久，蒋桂战争爆发了，红军利用这种形势，打开汀州，我们就在闽西、赣南大发展起来了。毛泽东在红四军“九大”时期，深感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在决议上专写一段反对主观主义。

当时，红军不仅战斗频繁，而且物质生活也很菲薄。下井冈山后，稍好了一点。对于这种艰苦生活，多数同志是吃得消的，以苦

为乐，以苦为荣。但是也有少数人由于长期斗争的疲倦而产生了离队思想、雇佣思想和享乐主义。有人愿意打城市（当时是小城镇），并不是从城镇工作出发，而是认为城市生活好些，吃喝方便些。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要求调白区工作，到苏联去学习，或者要去地方工作，觉得地方自由些。

有一个时期，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也很盛行，决议中举了许多表现。这种思想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那时物质生活水平很低，从军长到士兵吃穿一样，发同等的津贴。正像毛泽东说的：“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在那种情况下，相对的平均是需要的，利于坚持长期艰苦斗争，鼓舞士气，是团结内部和争取白军士兵的好政策，但绝对平均主义就有危害了。所以决议指出，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它碍于内部团结和革命斗争。

红军时代的民主生活是活跃的。党内畅所欲言，互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话就说，开诚相见。连以上单位设立士兵委员会，陈毅曾当过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有了士兵委员会，战士就有了发言机会，他们在会上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干部。排长、连长打人，犯纪律，士兵委员会可以处理。经济民主那时也搞得好，按时公布帐目，分伙食尾子，从而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但是，红军初期的民主生活，也存在着非组织观念和极端民主化的问题。非组织观点表现在，一是非组织的批评，一是少数不服从多数。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有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就不诚意地接受通过的决议，或者对决议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态度，这都会削弱或毁灭党的战斗力，损害党的统一性，对革命斗争极为不利，甚至造成部分的失败。红二十九团由井冈山回湘南的溃散就是一例。

红四军这时已经过两年的战斗，但极端民主化倾向还存在。有些同志片面地强调民主而不讲集中，要求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

权制”，事情不论大小，要一律“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这对革命很不利。无产阶级和革命军队在同阶级敌人的搏斗中，如果没有集中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就不能担任残酷紧张的战斗任务。决议中讲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既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又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反对极端民主化倾向，这是重要的思想建设。

总之，古田会议决议总结的经验有高度原则性，也很具体。对红军存在的错误倾向，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有的放矢地提出了纠正的方法。针对性很强，有废有兴，有破有立，文辞质朴，没有空谈阔论。直到今天，不仅在原则上，而且许多具体规定仍有现实意义。

(三)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①如何建立这种军队，苏联红军虽然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但还没有和中国革命军队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负担了这个历史任务。

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南昌起义后两年多来的建军实践经验，从根本上划清了我党领导的军队与旧式军队的界限，使我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原则系统化了，从而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对我军建设，尤其对政治工作的建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叶剑英1978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从古田会议到现在，我军的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它的根本原则，它的基础，还是古田会议奠定的。”

回顾我党70多年的历史，分析我军的发展进程，我深深感到，中国人民武装的建立及其成功的重要因素，是坚持古田会议的精神。古田会议之后，中央立即把红四军的这些经验介绍给鄂豫皖、广西左右江、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供各地红军学习、参考，

注①《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加速了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到了延安，又根据新的情况，结合古田会议精神，总结新的经验，军队建设又前进了一大步，直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古田会议决议对党、政、军的建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除了决议本身正确之外，还在于注意把正确的理论用于指导实践，不尚空谈。我们红四军在贯彻执行《决议》时，首先是统一思想，各级各单位检查落实情况，上级以决议的精神来检查下级，下级以决议的精神监督上级，真正做到上下一致，对重点单位有针对性地多做工作，对违反决议的同志视情节适当处理。

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感到，一个组织，一个干部，理论实践一致，言行一致是多么重要啊！好的决议，正确的理论，如果只停留在文字上，或者口头上，那是没有意义的。

古田会议决议为什么能够形成和顺利通过呢？我的看法是：

第一，中央来信，对开好这次会议有重大指导作用。第二，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三，红四军自“七大”以来，有许多新的经验和认识。第四，以总结经验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党内问题，是好方法。在这四点之中，主要还是陈毅去中央报告工作后得到中央的正确指导。

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陈毅即由苏区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是周恩来、李立三。陈毅将红四军两年来的革命斗争尤其是“七大”会议情况，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中央除口头向陈毅作了详细指示外，还于9月28日写了近万字的书面指示信。该信谈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内容丰富，不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而且对红四军的工作任务作了具体指示，正像毛泽东指出的，古田会议是“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来信主要内容是：首先对国际国内形势作了分

析，指出中国政局自蒋桂、蒋冯战争后，表面上蒋系的南京政府得了胜利，但实际上一切引起战争的矛盾并未解决，并且日益加深地向前发展，加上各个帝国主义的唆使，中国经济破产的加速，庞大军队需要财源维持，因此各自争夺地盘与饷源，又推动着军阀混战的危机。在这种形势下，红军要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发展壮大自己，只有紧紧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用工农暴动的力量，才能消灭军阀混战。来信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来信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指示红军要克服单纯军事观点，以免使红军的一切行动成为单纯的军事活动。来信指出，红军发展的方向，应该向着群众斗争有发展可能的地方，使当地的革命斗争深入，若停滞不前，将减少红军的政治意义。指示红军决不应以较小的兵力与较强大的敌人作殊死战，而应寻其较小于我的敌人，集中兵力坚决歼灭它，打硬仗的办法是无益于游击战争的。来信指出，红军的一切行动自然是政治的或军事的。但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中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的日常生活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所需要的，才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发动，才不是少数个人的英勇硬干，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来信还从六个方面提出了红军在做群众工作时要注意的问题。指出，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它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它的指挥应该集中，军队中的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不应漫无限制地搞极端民主化。来信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分析了原因，说这是由于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所造成的，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提出要以政治教育去发动红军士兵自觉地向，彻底纠正这些不正确的倾向，但又要坚决地废止肉刑。最后，中央指示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

向敌人作斗争，实现红军所担负的任务，并指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当时，红四军接到中央的来信都表示同意，除了大家对中央有很高的信仰外，还因为来信不但有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经验，而且也符合红四军的实际。所以信中的好多具体内容，都吸收到决议之中了。

讲到古田会议决议，就涉及到林彪。林彪后来俨然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把朱德、陈毅放在他的对立面，诬之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他年年讲“复古”，年年批老师。大家知道，朱德是我军主要缔造者之一，陈毅对我军的创建与发展也有很大的贡献。南昌起义失败后，一部分保留下来的队伍在他们领导下，转战闽粤赣湘，在部队思想混乱和物资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鼓励大家继续革命，做失败时的英雄。朱德、陈毅整顿了部队中的党团组织，宣布了军队的领导关系和革命的纪律，把一部分党、团员分到连队去工作，加强了基层组织，处理了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样就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作用，保存了革命武装。诚然，在古田会议形成决议和通过决议中，朱德、陈毅也和大家一样，得到提高与进步。例如，陈毅在会议上作的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以前是没有讲过的，他这时讲得那么慷慨激昂，入情入理，是通过长期斗争实践得来的真理，所以讲得大家心悦诚服。

林彪一伙说只有林彪是拥护古田会议决议和拥护毛泽东的，这是欺人之谈。善于思考的人都会懂得，如果只有林彪拥护毛泽东，就能形成决议？就能通过决议？这次会议是前委准备的，而前委是以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为核心，林彪在大会上和大家一样举手赞成而已。

(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这里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决议当作行动的指南，同发展变化

的新形势相结合，用决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学风；另一种是把决议当教条，不区别情况，不加分析地任意套用，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伟大人物的理论、决定，即便是正确的，也有时间与空间的制约。他们的理论、政策，尤其是一些具体问题的结论、决定，常常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针对具体对象做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不一定适合或不完全适合于发展了的客观实际。“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后，我党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把工农兵苏维埃改为人民民主共和国，后来又把“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为什么要改？因为原来的口号与新的历史时期不相适应。有些理论是对特定范围——一个国家、民族、地域作的，而对别的国家、民族，就不一定适合或不完全适合。如马克思关于城市武装起义的口号，是从当时欧洲产业发达的国家说的，但不适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开展农村游击战争，进行武装割据，从而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理论。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里讲，武装夺取政权，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普遍规律，但究竟是城市武装起义还是农村包围城市，就应该作具体分析。毛泽东在1967年肯定了日本朋友说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不适于日本的意见，这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就拿古田会议决议来说，其中某些具体条文，现在就失去了针对性。比如流寇主义，当时是针对那种政权观念淡薄、流动游击的思想提出来的。全国解放后，我们建立了全国政权，这个观点就没有具体对象了。我们必须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则列宁就不会在自由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时代，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理论，也就不会有十月革命；毛泽东就不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得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理论。所以要改变那种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现成公式到处乱套的做法，改变凡是上了书的不准改、未上书的不能说的思想。不注重现状，不注重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生机就会停止，

优良传统就会失传，社会就不能前进。因此必须提倡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这样才能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并以他为首缔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长期斗争，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和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推倒，建立起独立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他的丰功伟绩是永远也不能磨灭的。他的理论，是革命人民长期斗争实践的总结。他自己也说过，他那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打了十年仗才写出来的。我很欣赏这句话，正是由于十年革命战争的实践，才能使他的战略天才得以发展并作出科学的总结。唯物史观告诉我们，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他们创立的理论以及主持制定的政策，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产生、发展并不断完善的。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可能或者说难免会产生错误。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主要是：第一，由于斗争形势的紧张复杂，占有材料不够丰富和全面，而当时又急需作出决定，就可能作出些不合实际的结论。如十月革命后，俄共（布）曾经打算用军事共产主义的办法来改变经济形式，打算直接用国家法令、按共产主义原则，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等问题，结果行不通。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说：“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中央苏区在1930年5月，发现内部有所谓AB团的线索，到同年10月下旬以后，总前委主要领导者未经查证和认真分析，作出“绝对进攻，跟踪追击”的肃反方针，从而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

第二，人的认识即便属于唯物主义体系，也可能产生片面性。正如列宁说的：“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

注①《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

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①如偏听偏信，因为是偏听（不是兼听），从这个片断、碎片、小段直线地引伸下去，就必然成为偏信。在革命时期，客观事物复杂多样的情况下，事物本质未暴露前，很难把握。人们对事物的研究和认识前后可能产生反复或停滞不前，甚至不一致。

第三，革命内部复杂，特别是野心家、阴谋家的干扰破坏。搞些颠倒黑白的材料，耸人听闻，拨弄是非。这种人善于逢迎，投其所好，领导人如果不自觉接触群众和忠贞正直的人，就难掌握真实情况，形成偏听偏信，听任奸臣弄权，这对执政党后果极为严重，甚至不堪设想。

第四，党内生活不健全（个人崇拜，家长制等），民主集中制和国家法制不健全甚至受到破坏，个人的政治和党性修养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使得一些消极的因素容易散发，且不受制约。一个革命的政党对后代人应该负责，后代人对前代人也要负责。我党在打倒“四人帮”后，及时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以后不久，中央决定撤消十二个文件，平反大量冤假错案，等等。正是对前代人，对党和人民事业负责。

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要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没有政治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就要失去生命；没有政治工作去抵制资产阶级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证军内外的团结和组织上的纯洁巩固，就不可能战胜像张国焘、林彪、“四人帮”这样的反党集团的进攻；没有政治工作唤起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保证严格地执行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就不能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同样，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去保证执行。我们搞四化，是在经济技术比较落后，社会主义制度有待巩固的条件下进行的。四化本身就是新时期革命发展中最大的政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